

元宇宙的“洞穴”

□张慧瑜

近期,元宇宙成为媒介、文艺等领域讨论的热词,尽管元宇宙还远未变成现实,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构想”,被作为元宇宙例证的大多是好莱坞的科幻电影,这充分说明人们对新技术所创造的未来世界的狂喜和担忧。目前认为元宇宙最核心的标识是虚拟现实,人们进入元宇宙,如同网络游戏玩家进入游戏世界,与现实社会平行的虚拟空间。“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钱学森30年前畅想未来科技时,把虚拟现实技术翻译为“灵境”,是一种更带有中国神话色彩的幻化之境。现代以来,新技术的革命必然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形态,但与此同时互联网所制造的虚拟空间也与现实世界形成新的融合,或者说互联网嵌入现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如果未来元宇宙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应用,那么元宇宙究竟是嵌入已有的社会结构,还是逐渐“蚕食/包裹”现有的社会形态,这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不过,技术的革命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意义上的进步,有时候反而会固化既有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改造元宇宙,使其更好地促进社会自由与平等也是应该思考的维度。

柏拉图的洞穴:元宇宙的“旧”与“新”

如果把元宇宙作为一种虚拟现实的幻象,那么元宇宙的体验并不新鲜,而关于元宇宙混淆了虚幻与现实、让主体沉迷其间等反思看似犀利,其实也来自于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了“洞穴寓言”的故事,一群被捆绑的奴隶,每日在洞穴中看着墙壁上的影子,认为这些影子就是现实世界,直到有一个人逃离了洞穴,来到地面,看到阳光下的现实,才意识到墙壁上的是现实的影子。这则寓言在古希腊时期被作为人的认识的限度,现实世界是观念的投影,人只能看到“真实的摹本”,也就是墙上的影子。在启蒙时代,这则寓言被解读为理性与蒙昧的故事,阳光下的世界是被启蒙的、被光照亮的现实,是科学、理性认识的现实,而洞穴里的影子则是愚昧的、虚假的所在,启蒙是离开洞穴追求理性和科学的光芒,成为自由的、自主的现代主体的过程。在20世纪,这则寓言再次被阐释为关于电影的本体论,电影、影像等现代媒体制造了新的洞穴情景,观众、受众变成了被捆绑的“奴隶”。在数字时代,虚拟空间也被认为是一种数字洞穴式的体验。显然,元宇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柏拉图洞穴,而且是“影子”取代了现实的超级真实的沉浸式洞穴。

从柏拉图洞穴寓言的角度,关于元宇宙的讨论延续了20世纪现代媒介诞生以来所提出的一些旧话题。19世纪中后期以来摄影、电影变成机械时代可复制的视觉影像,留声机使得声音变成可复制的听觉符号。相比印刷媒介所依赖的抽象文字,现代视听媒介扩充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经验,与此同时,这种更像现实“影像”和真实“声音”的“摹写”,也造成对人们迷失其中的担忧。尤其是视觉媒介出现之后,这种无处不在的模拟影像制造了景观社会的想象,主体在景观社会中变成被捆绑的现代“奴隶”,如《娱乐至死》(1985)中所批判的电视把观众变成无脑的土豆,或如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中所呈现的被监视、被观看的楚门成为真人秀时代的囚徒。互联网时代,文字、视觉、声音等不同介质的媒介都转化为以0和1为代码的数字王国,数字媒介提升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和能力,也让人们感受到《黑客帝国》(1999)中人类幸存者被虚拟系统Matrix所操控的囚徒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就像“黑客帝国”一样,主体沉浸在虚拟空间中变成数字代码。这种“游戏”于元宇宙的数字主体,有可能变成《头号玩家》(2018)中的超级英雄,也有可能变成《饥饿游戏》(2012)中随时被“大逃杀”的绝望者。

(上接第1版《让人类在科技时代诗意地栖居》)

科幻不仅是技术,更是思考现实的方法

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突破,都会改变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进而影响人的世界观、伦理观,影响到人之为人的定义。《十月》副主编季亚妮介绍,《十月》杂志与中国科协合作开设了“科技工作者纪事”栏目,由作家采访科学家,以报告文学形式向普通读者讲述科学家的故事,展示中国科学事业的代表性成就,如讲述“中国天眼”南仁东团队的《疯狂的梦想》、讲述国防科技大学超级计算机自主创新团队的《大国引擎》、讲述薛其坤及其量子世界的《超越欧姆定律》、讲述中国探月工程吴伟仁团队的《奔向月球》、讲述野外科考故事的《植物猎人刘正学》等,并刊发了不少科幻类小说,以及借用科幻形式的现实题材作品。她说,科技与文学的跨界融合,也是《十月》杂志近期关注和思考的方向之一,除以提升大众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目的的科普类作品、科技纪实作品和所谓“硬科幻”作品外,更为关注科幻文学。科幻写作所带来的想象力正在重新定义和打开文学的边界线,提供观察世界和现实的新角度。《三体》《黑客帝国》等都提出了根本性的文学和文明意义上的母题,这些母题不仅被科幻写作也被纯文学写作所继承。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是“向未来”的文学。此外,音频、视频等媒介也被广泛使用,机器人写诗、AI创作等新尝试也在不断进行升级,文学创作的传统边界越来越模糊,这是科技在逼迫我们反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核。

据《科幻世界》副总编辑、《三体》责编姚海军介绍,《科幻世界》杂志的主体栏目既包括“银河征文”“校园科幻”“科学”等开设时间长达二三十年的经典栏目,也包括“脑洞问答机”等灵活多变的小栏目,其中对小说的密切关注,反映了杂志对科幻趋势发展的把握和对潮流的引领能力。《科幻世界》的图书出版项目已经成为杂志社的支撑项目,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之一《三体》的巨大成功,推进了整个中国科幻产业化的步伐。他认为,一种类型文学是否立得住,要看它是否有足够“破圈”的畅销书,畅销也就意味着更多可能。《三体》成功的意义即在于此,它在海外为中国科幻赢得了巨大声誉,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型。谈及当下的“科幻热”,姚海军说,科幻奖项和征文比赛的增多是“科幻热”最直观的表现,其结果是每年都有新作者涌现,为科幻创作队伍带来了新鲜血液;科幻主题也越发多元,比如语言学话题,过去的科幻很少涉及,近几年却受到关注。这也是科幻作家们对现实的回应:世界加速分裂,人们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彼此。“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科幻作品只是走得更远一些,预言了科技统摄下我们的生活将要面临的新挑战抑或未来的可能性。”

科幻不仅仅代表一种技术层面的未来性,更是一种关注和思考现实的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此专门成立“未来文学”编辑部,专注于科幻领域,以便更好地朝前看、朝未来看,并加强与科幻机构的合作,如与微像文化合作出版《春天来临的方式》,国内国外双语同步发行。这本书收录的都是女性作家的小说,中国女性科幻写作者为科幻文学贡献了独具一格的优秀作品。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伟长看来,科幻文学并非科幻与文学的嫁接,而是文学的一部分,只不过科幻的元素多了一些而已。文学与文学跨界如今成为一个问题,本身有尴尬和无奈。“在文学史上,一个行业的知识进入文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茅盾的《子夜》第一次写到了较为专业的股票知识,就称之为股票小说或者商业小说。今天在对科幻小说进行讨论时,对科技与文学做如此区分,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对科幻文学还不够自信。好小说就是好小说,并不因为它披着科幻的外衣就被高看或低看一眼。”他表示,科幻类作品前景可期,但前提是我们平等看待它,要能够将它视为文学本身。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可能性,单独看待科幻小说,难免会陷入题材论的怪圈。

对元宇宙的担忧和改造

如果从互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区、虚拟空间以及虚拟主体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分裂等角度来理解元宇宙,元宇宙一点也不“新”,只是数字社会的加强版。不过,从技术革新的角度看,元宇宙又是一种“新技术”所带来的“质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虚拟现实设备所制造的神经、身体幻象带来更真实的沉浸感;二是人工智能使得机器设备更加智能化,人文、社会等领域出现越来越多人工智能应用;三是生物基因技术更加成熟,人机融合等赛博现象变得更为日常。基于此,人们对元宇宙也有三重的担忧。

第一,丧失主体感。元宇宙的未来体验经常被类比为网络游戏,玩家进入游戏空间带来双重主体体验:一是高度自主化的主体,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可以选择不同的“剧情”,如同进入“自由自在”的极乐世界;二是“牵线木偶”般的被动主体,网络游戏里的所有选择都是在既定游戏规则下的可能性,游戏代码和后台数据如同上帝之手一样,使得主体变成了结构主义视野下的丧失主体性的主体,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先在臣服的主体。元宇宙让人们更形象地感受到这样两种分裂的主体状态,自主化的主体幻觉与被系统、算法派定了特定位置的主体。

第二,丧失真实感。相比文字、美术、电影、电视所呈现的真实幻觉,元宇宙式的虚拟空间更容易“以假乱真”,如同钱学森用“灵境”来翻译虚拟现实,这是分不清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的世界;又如2011年以来英国Mini系列剧《黑镜子》中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黑科技,有一个是意识、精神和思想都能变成可以上传和下载的数字信息,主体在云端将获得永生。元宇宙进一步印证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现实不复存在,自以为真的“现实”不过是墙上的“阴影”。

第三,丧失社会性。电脑界面、手机界面成为进入虚拟世界的“接口”,在虚拟世界中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即便口腹之欲,也可以通过外卖来解决,人们变成元宇宙公民,在现实世界中处于去社会化、去社交化的状态,这就使得元宇宙变成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替代”。元宇宙不只是让人们陷入“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而是生活在具有数字社会性的云端社会,或者说元宇宙重构了新的虚拟社会空间。现代社会中既有的矛盾和问题,在元宇宙社会中也同样存在,甚至被放大和强化。

如果换一个思路,与其批判元宇宙带来主体感、真实感和社会性的消失,不如反思元宇宙所塑造的虚拟社会的社会性议题。在大多数关于未来社会、信息社会的科幻电影中,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在这些电影中会尽情展示未来科技的发达和智能化,如机器人替代了大部分工作,甚至星际穿越、基因改造也变成现实;另一方面这种未来世界在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上却大部分是高度等级化的封建制、奴隶制和殖民制。这成为科幻电影《大都会》(1927)以来,到《阿凡达》(2009)、《饥饿游戏》(2012)、《阿丽塔:战斗天使》(2019)、《沙丘》(2021)等科幻电影一以贯之的传统,也就是说人们能够想象一个技术上无比发达的“元宇宙”,却无法构想在社会关系、政治形态上更进步、更平等和更自由的“新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元宇宙的反思依然无法脱离其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技术所表征的生产力依然无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相脱离,否则元宇宙只是旧世界的“镜花缘”,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满足的“欲望”提供一种想象性抚慰。(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上接第1版《坚守文学的“革命根据地”》)

通过采访深入人的心灵深处

为采集红色文学素材,卜利民走遍了赣南18个县市的365个乡镇。创作就是这样,你在寻找素材,素材也在寻找你。写《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部书时,卜利民先后采访了上百位女红军,书中写入几十位,每一位都曾经让他感动。

采访中,最让人揪心、让人流泪的,是采访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李溪组的池煜华老人。有一次他在兴国县采访,离别前夜,兴国县党史办主任黄健民听说卜利民在撰写书稿《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忽然提到苏区时期曾担任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的李才莲。红军长征后,李才莲留下来打游击,下落不明。就因为李才莲临别时说过一句话:“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和你团聚。”78个春秋过去,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至今仍任翘首等待。

卜利民彻夜无眠,决定专程去拜访池煜华。恰逢中秋节,卜利民买了月饼、水果,打摩托车赶去采访。道路坎坷,拐弯时,摩托车轮把卜利民的一双新皮鞋带人轮胎绞坏,整个鞋后帮烂了,也把卜利民原本残疾的右脚带进轮胎胎去一块皮肉,血流如注,只得半路折回,卧床养伤3个多月。半年后,卜利民再次踏上采访之路,翌年11月底与池煜华见面,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那场革命,池煜华无从选择,随滚滚洪流而行动。李才莲临走时要她等待,她愿意等待,就选择了等待。等待最容易也最难,与她一起等待的人,有的等到了,有的不等了,她还在等待。她先后带大3个养女,1个养子,为了活命,80多岁的人还要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县城去卖柴,精神、经济、体力负担像三座山一样压着池煜华。

采访之后,卜利民陆续写了几篇文章,如《守望沧桑》《一诺百年的爱情守望》,在全国26家报刊发表。后来,卜利民和文友还成立了一个摄制组,为池煜华拍纪录片。这些文稿和视频相继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播放。许多记者纷纷踏入这片荒僻的山乡,池煜华渐渐走进了全国公众的视野。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坚守、需要定力,80多年过去,池煜华仍没有等到她所等的人,但这也是一种活法。当然,她也不是单纯地等待,她用自己的爱温暖了子女,生命也因此而变得充实。

一年过去了,有人带来口讯,池煜华问:“老卜还好吗?”卜利民听了很感动,山村人把人唤做“老某”,即便你不老也唤做“老”,那是一种尊重。那天午后,卜利民来到她的住处,那一幢近百年的砖土混合建筑,她住在一间过去的牛栏里,白天如同黑夜一般。她气喘吁吁地问:“你有几个小孩子?”卜利民回答:“两个。”她从被窝里坐起来,摸摸索索地掀衣裳,露出瘦瘦如柴的身子,突然从贴身处掏出一样东西,带着一股浓浓的汗味,热乎乎地塞进卜利民手里:“你的老婆孩子,每人一块。这还是才莲当年留下的……”卜利民浑身一颤,是三块苏区银元,大惊:“这么珍贵的东西,你老人家自己留着!”池煜华哽咽道:“我快要死了,这世上除了你们,我一个老婆子也没有什么人了。”硬把银元塞给卜利民。“妈妈,你把银元留着,卜利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卜利民泪水流了满面,又把已成为文物的苏区银元还给她,那银元上氤氲着她几十年的体温,以及更久远的李才莲的体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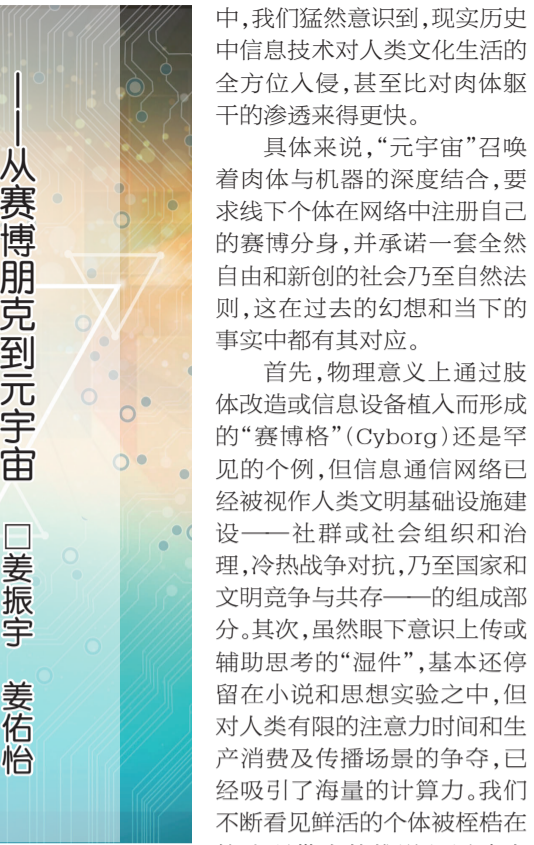
如同韩裔美籍学者朱瑞英在《隐喻会梦见语言之眠吗?》一书中所提及的,工业革命之后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已经无法真正对现实图景进行表现(representation),而只能依赖于隐喻来提供某种并不精确的模仿。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正在失去它直抵现实本质的力量,反而是凸显了人类在面对难以把握的共同困境之时所激发出的想象力量。毕竟物种意义上的人类的更新演化,需要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而组成当下人类生存环境的新产品,往往是以季度和星期来排列迭代的次序。

“元宇宙”,以及这个概念的流转与发展历程,正是对当下人类所面对的困境的绝佳隐喻。我们用这个有着清晰词义错位的翻译,来指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所必然导向的下一个阶段。一方面,由于人们对“下一代互联网”有着千差万别的认知和描述,因而这个词被用来指代一系列差异颇大的未来图景;另一方面,“元”而且“宇宙”,这个词词义较“Metaverse”响亮,二者之间的这种错位,又给中文语境下本土科技文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

有趣的是,这个来自科幻小说的自造词汇,不仅击穿了科技界、互联网圈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壁垒,而且将关于未来的幻想与焦虑,广泛地散布到了人文学者、政务部门人员以及最广大的网络用户当中。这种只属于信息时代的传媒事件,正如位于概念核心的“虚拟现实技术”一样,在诸多层面上打破了人机界限,改变了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相互链接的基本方式。而这一切也预示着,近半个世纪前赛博朋克所描绘的晦暗未来,正在加速弥散成一幅更加混沌的世界图景。

赛博朋克叙事的幼稚之处,在于它虽然意识到了技术资本所必然带来的全方位压迫,却仍旧寄希望于一个依托于个人原生性的天才,以及个体所能掌握的科技资源,来形成一个反抗性的——或至少标榜着不合作性质的——乌托邦。在从《神经漫游者》到《雪崩》的赛博空间图景中,线下生活的平庸与困顿是线上个体全面解放与全面超越的充分必要条件。这种前互联网时代的幼稚幻想,实质上仍旧是在以个人英雄气概来抗拒——甚至不是反抗,更毋庸说革命——“终结历史”的晚期资本主义。因此,现实中这场文艺运动的繁荣兴起到迅速凋零,恰好与其文本中所浸透的绝望抗拒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其后无论是将菲利普·迪克的疯癫道认为赛博朋克先驱,还是在《攻壳机动队》或《铤梦》之类灌注着阳和残响的异域风情中寻找文化血脉,都难以延续那些尚未逝去的先辈在青年时代的热情、真诚与痛苦。

这些来自文艺虚构的无奈与绝望,随着现实网络空间以及赛博文化的发展,影响着当下具备更深刻不确定性的“元宇宙”叙事。在对这个来自上个世纪以及上个时代的词汇进行概念考古和思潮定位的过程中



中,也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部分情绪和人格以模块化的方式放置在不同的互联网巨头所提供的“空间”与“平台”之上。最后,尚值得庆幸和期待的,是伴随着诸多话语权力斗争和技术管理的摸索,全新的文化公共空间正在形成,全新的议事规则和新闻传播逻辑也正在演化。当然,这种不断变动的发展变化,恰如生命与环境在数十亿年间的磨合与选择一样,迫使每个个体和社群都独立地进行学习、适应,或者付出代价,或者成为代价。

小说与现实,哪个更令人气闷呢?赛博朋克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拥有“高技术”,却仍旧过着“低生活”,他们的科技和资源无法革新、引领抑或影响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只好掩藏自己的真名实姓以求有限的自由。在现实中,从本中听到斯诺登,从海盜湾到Sci-Hub,“大巫师”们的传奇固然还在延续,但他们无不托庇于机器与机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缝隙。在可以预先设想到的层面,文本内外、线上线下似乎打了个平手;但在科幻作家孱弱的想象力之外,更晦暗的事情正在发生。相比之下,马斯克、扎克伯格这些“外星资本家”们拥有强大的技术储备、计算能力、政府扶持和舆论支撑。掌握了“高技术”的他们,也过着“高生活”。当“元宇宙”被推动、推广和推进的时候,他们不是反抗大机器的螺丝钉,也不是从主流市场中自我放逐的赛博朋克,而是在迷幻药和电子迷幻药之间预想着人类的未来演化方向。他们是“把海鱼干的鱼”。

我们知道,未来是现在时间维度上的无限延伸,它的可能性早已内蕴在眼前世界的某个角落当中。技术权力的争夺轰轰烈烈,随之而来的奴役悄无声息,其中尚且蕴含着走向彼此共通之人类解放的惶惑与希望。因此,这篇文章合适的标题可能是“个体解放@群体奴役”,就如同电子信箱中的“@”,“@”后面的符号代表的是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服务商。“元宇宙”技术和场景,主要是由这些大资本或者商人提供/垄断。“元宇宙”中的个体解放,也是建立在“外星资本家”们所提供的基础服务或者描绘的图景之上的,即在群体奴役中寻找个体解放。

(姜振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专职博士后,姜佑怡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博士生)

再往后,就传来池煜华的死讯。她是突然去世的,享年95岁。去世前她说过有两个儿子,其中之一是卜利民。天阴云重,卜利民立即赶往那座高高的秦城山,湿漉漉的山岚挟裹着凉意,他小心翼翼地在老人的棺木上覆盖一面鲜红的大红绸缎被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40多年来,卜利民沉浸在赣南这块红土地采访中,不知不觉,就有了100多个红军留下的“女人缘”。那些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在卜利民的目光注视中慢慢老去,一个个相继消失,所剩无几。但卜利民永远地记住了她们,她们的生命故事通过卜利民的写作,永远留在了这个世间。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卜利民把采访对象当成自己的亲人,不但在他们活着时去采访看望,死后也要作为红军的儿子去奔丧。作家和作品某种意义上是在代替采访对象活着,其信念和精神像血液般流淌在作家体内,流淌在作品的文字里,让心灵得以纯净,让生命得以升华。

记录好生活中流淌着的人和事

作家如果不能深入生活,就像蚯蚓离开了芬芳的泥土。为了一个题材,卜利民往往用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数十次去一个村庄采访、写作,像蚯蚓一样钻进泥土,品尝生活的苦涩和甜美。文学作品需要培育,生活是培育作品的温床。所以,要深入生活,锻造自己、完善作品。收集和保存采访记录,是对这个时代负责。无愧于时代,实际上也是无愧于自己的创作和人生。

2020年,卜利民带领一个8人小分队重走长征路,这也是他第三次重走长征路。他们游泳渡过了长征路上的5条大河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大渡河,其中乌江是冒雨强渡,赤水则是夜渡。他们赶路到土城时天色已晚,第二天一早又要赶路,而当红军是在土城战役失败的情况下强行渡河的,从傍晚渡河直到天亮。俗话说,近则怕鬼,远则怕水。因为不熟悉水性,队友们在夜色中向对岸游去,快接近对岸时被一股激流冲下去几十米远。危险在水里也在岸上,脚下尖锐的石片把卜利民的脚割破了……泅渡长征途中的大江大河,是卜利民多年的心愿和策划,这些经历都是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具体行动。

卜利民退休后,生活变得更加忙碌充实,除了坚持不懈地采访创作,他还照样是深入生活的积极参与者。2017年赣州市委组织成立了“红军后代十九大报告巡回宣讲团”,在此基础上,他又组织几个红军后代发起成立了“赣州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央苏区红军后代故事会”,现在已发展了6个基层分会,数百名红军后代、高校教师、党史专家学者,作家加入成为会员。2021年年初,卜利民提出“庆祝建党100周年讲1000场党史故事活动”,组织会员们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中专院校、企业、社区讲党史故事。据不完全统计,现已讲述党史故事1200多场。9月9日,他又带领《不灭的军团》采写组出发,沿着红军军队的战斗足迹,准备挖掘、收集、写作一部以红五军团从诞生至牺牲为主线的作品。

生活的馈赠无处不在,生活的责任和担当也无处不在。深入生活、创造新生活,珍藏好生活中的痕迹,记录好生活中流淌着的人和事,这也许是卜利民的另一部或几部作品的开端,是正在行进、还在成长中的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